

珞珈中国哲学

明清哲学

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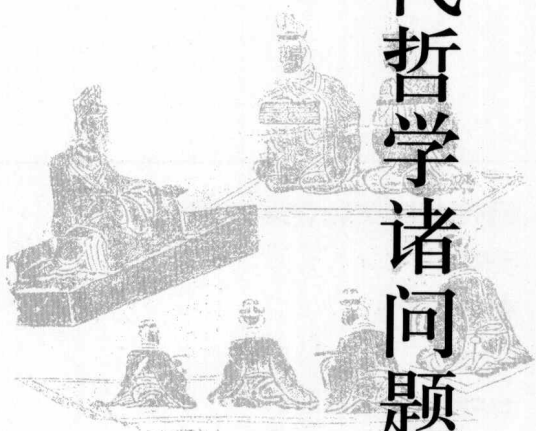
吴根友 著

中华书局

珞珈中国哲学

明清哲学

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



吴根友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吴根友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3

(珞珈中国哲学)

ISBN 978 - 7 - 101 - 05993 - 9

I. 明… II. 吴… III. ①古典哲学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 ②哲学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608 号

书 名 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

著 者 吴根友

丛 书 名 珞珈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 朱立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3¼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993 - 9

定 价 50.00 元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 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 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 20 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 20 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

学,而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大陆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蓬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之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年2月4日

序 言

中国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或近或远地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相关联:中国如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将明清三百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经济因素,思想界出现的新思想看作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萌芽的学术观点,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观点之一。这一学术观点还涉及更大的学术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发展的还是停滞的,现代化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经验还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究竟如何发展自己的现代文明,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固然,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行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但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生活模式,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时代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活动之中,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保持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独特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多元的文化格局是否能达成一个低度的文化共识?如果全球化时代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缺乏基本的低度文化共识,我们的交往是否可能?如果有一个基本的低度文化共识,那么这种低度共识的文化理念究竟是什么?是基督教的博爱,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其他宗教、文化的理念?由现代西方文化最先发展出来的一套文明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究竟是普世的价值,还是特殊的价值?每一个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可能因为每个人的专业分工,个人兴趣的不同,并不一定都要直接思考这些问题。但

任何人文学者的研究都应当有益于当代及后代人的生活,则是一个不算苛刻的人文学的尺度。

我个人的学术起点是明清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自1989年追随萧蓬父先生研究明清哲学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发掘明清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本书的甲、乙两部分文章,多是继博士论文之后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从时间单位来看,20世纪已经过去了。然而20世纪明清学术研究的成果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与反思,从而进一步推进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晚期,是西方汉学家们的学术设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先生亦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封建社会的后半段时期。而胡适之先生干脆将自北宋至晚清的近千年历史看成中国的“近世”,这与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等人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看成是中国近代时期的观点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我个人认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近代性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学术观点,但是要深化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必须要综合反思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与宋明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尤其不能简单将明清学术、思想看作是对宋明的“反动”,而应当是,既要看到明清学术、思想对宋明学术、思想批判、创新的一面,又要看到明清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思想继承的一面,这样,将会更加贴近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的事实。由此,我们既可以反驳西方近现代以来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的各种论调,亦可以深入反思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致扼制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社会与思想因素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史的“支援意识”。

其实,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之中的中国人,一方面眷恋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感叹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肤浅化与人的平面化的缺失。当代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儒教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复兴,正昭示了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某种精神的需要。儒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三代新儒家们共同的精神努力方向。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现代新儒家们的集体思考成果已经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遗产。而透过新儒家的思考再

次回溯到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将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思想过程。本书的第三部分的几篇文章正是近十年来我个人在这方面思考的部分成果。我个人认为,现代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承认个人自由,而现代自由主义是从学术上最为全面地阐述了自由的价值及其适用范围的思想体系(尽管它没有穷尽“自由”的全部奥义)。而儒家思想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是其“仁学”思想,“仁学”思想中的核心理念是“把人当人看”。正因为儒家思想拥有这一核心理念,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才拥用了可以沟通的精神通道。而这也是儒家学说能够穿越漫长的历史隧道,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与西方哲学始于惊异、终于“求智”(或曰爱智)的精神风貌略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虽也不乏对形上之道的关怀,也有“神道设教”的宗教性维度,但其神韵还在于此世生活中理想人格的养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所有思考,落实在实践哲学层面,最终都关系到人格的培养问题。然而,现代中国社会在接受西方近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知识精英的人格理想,特别是儒家的大丈夫人格、君子人格曾经一度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西方社会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与宗教的神圣化相对立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倾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与精英人格理想相对立的“平民化人格”亦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倾向。当然,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精英人格理想也曾经以另一种歪曲的形式出现过,那就是现代的“英雄人格”形象。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亦重复出现。从各种禁忌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如何确立自己人格的内在统一性,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是中国当代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的个人精神生活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契先生,将现代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结合起来,提出了“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思想,将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书的第四部分的论文,正是本人近十年来对此问题进行尝试性思考的结果,而如何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人”是近些年来本人

从事所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自19世纪末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问题，因而所有的人文学术都不得不以此问题为核心目标，从各自的学科特点出发来回答这一问题。本书的所有文章都是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而给出的个人回应，至于其中是否有一得之见，期待学界同仁及其他关心时代问题的同道的评断，并恭请方家赐教。

目 录

序 言 (1)

甲编 明清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关于宋元明清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的思考 (3)

20 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 (11)

熊十力“明清学术史观”斟评 (31)

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41)

乙编 戴震、郑板桥与明清哲学研究

20 世纪戴震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51)

分理与自由

——戴震伦理学片论 (104)

戴震哲学“道论”发微

——兼评村濑浴也《戴震的哲学》 (117)

言、心、道

——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

理论的开放性 (131)

《板桥家书》中的仁爱思想 (148)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性因素之分析 (159)

明清之际三种人性论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向	(171)
清代前期民主政治理想与儒家政治哲学 的近代转化	(186)

丙编 儒家思想与政治哲学

从人道主义看儒家“仁学”与自由主义 对话的可能性	(203)
徐复观与儒家政治哲学	(219)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杜维明 “文明对话论”的政治哲学检视	(231)
道义论 ——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 问题的论证	(243)
儒家“王道天下观”与当今国际和平	(256)

丁编 理想人格与现代性反思

儒家“君子人格”及其现代意义	(277)
“恒德”追求与自由意志 ——传统中国人道德自由意志鸟瞰	(289)
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	(296)
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 ——殷海光与冯契自由思想之比较	(308)
现代人文精神内在架构寻绎	(323)
我们如何做个健全的“现代人” ——对现代社会与自我存在的反思	(346)

甲编 明清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关于宋元明清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的思考

一、从“通观”的角度看宋元明清哲学研究的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

考察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肯定明清哲学具有启蒙性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活水源头的部分学者,借用西方近代文化与现代性的话语,努力发掘明清哲学中的新思想因素及代表这种新思想因素的思想家;而肯定宋明理学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的部分学者,则强调宋明理学对现代中国道德意识的培养与人格境界的提升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双方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都有自己的学术名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如何重新反思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话题。

我个人认为,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第一是从学术、思想的连续性、继承性的角度看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是从学术思想发展的断裂性与发展性的角度看明清哲学对宋明理学思想的部分突破。这一点,梁启超、侯外庐、萧蓬父等一大批学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大陆明清学术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侯先生开创的思路与

方法推进的。在这两种最有影响的思路与方法之外,还有第三种思路与方法,这就是20世纪前期由胡适开创的“通观”的研究之路。由于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明清学术、思想与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被其他方面的成就淹没了。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提出的“近世哲学”(有时用“近世思想”)的概念,较早地将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看作是一个整体,既看到宋明理学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又看到反理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对理学的突破。他认为,所谓“近世哲学”,即“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便是中国近世哲学”^①。后来,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一文中(该文原系英文,发表于1942年10月的《亚洲杂志》),他又进一步地补充道:“而近世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②

胡适的“近世哲学”观念,可以说从“通观”的角度——既看到明清哲学与宋明理学的继承关系,又看到了明清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一面——来研究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哲学。他的这一宏观视角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21世纪的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研究要想取得新的突破,方法与视角的更新是必需的。传统的方法当然仍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新方法与新思路将会拓展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

在当今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我们又如何能进一步从“通观”的视角深化宋元明清哲学的研究呢?我的看法是:

第一,从纯思想史的角度看,尽可能避免生搬硬套西方各种理论,进一步研究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家、思想流派的第一手资料,从宋元明清思想的问题意识出发,运用中国思想固有的概念揭示他们思想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从而更准确地描述近千年来中国思想变

^①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页。

^② 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上,第515页。

化、发展的历史,这仍然是需要花大力气要做的事情。

第二,从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出发,我们应发掘近千年思想传统中有益于当代社会人心与世道的思想观念,揭示作为资源意义的宋元明清思想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价值。这就需要我们用同情了解的态度对这近千年思想中有益于当代社会的各种观念,做出恰当而又公允的新的诠释。这涉及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创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种解释模式就会发生冲突,而且这也是20世纪宋元明清学术研究发生争执最为激烈的领域。当代宋元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首要任务将是在深化第一手思想史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总结这部分思想成果,努力推陈出新。

第三,努力从世界史的眼光出发,在比较文化的大视野里,重新审视明清学术、思想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文化之关系。因此,对国际汉学中有关宋元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地关注。此处将着重探讨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标准与参照系的理论问题。

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参照系与文化价值的取舍标准问题

文化比较是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研究活动中自然会产生的一种文化研究活动。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文献的不足,或由于研究者对他者文化的相对陌生,在研究过程中常常得出在母文化人士看来非常不贴切的结论与观点,从而导致有些人否认文化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其实,文化现象正如其他的认识对象一样,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文化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开始会出现一些不甚准确,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结论,也是难以避免的认知现象,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这一认识的原理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梁启超、侯外庐等人在明清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在借用西方的思想来甄别、评价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特性时出现的一些比附的观点。但他们开辟了比较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将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纳入到世界史的范围之内,筚路蓝缕,功莫大焉。我曾经在《二十世纪